

# 從「天下」到「國家」

## ——戊戌維新一代的世界觀

● 孫隆基

在馬克思主義史學裏，中國民族形成是一個主要的研究項目。按照斯大林的教條，民族形成是資本主義上升階段的現象，范文瀾卻認為中國民族形成於秦朝大一統<sup>①</sup>。在這裏，爭辯所圍繞的是一個定義，姑且擱置勿論。至於中國「民族國家」觀念起源於何時，則是另一個命題，而且，這個概念作為一個有生命的符號學系統，其生長有脈絡可尋。

今日史學界一般的看法是：中國現代式民族主義首見於1890年代戊戌維新的一代<sup>②</sup>。但我們在下面將指出：1890年代的所謂「民族主義」仍大半為「天下主義」陰影所籠罩。另一方面，傳統的天下主義亦非純淨，它大半屬於理論和儀禮層次，落實於現實層次時，操作的彈性頗大。大清與俄羅斯在1689年簽訂《尼布楚條約》，即以平等互待。此外，天下主義與否，種族主義在中國也源遠流長，該意識在中土面臨異族入侵時尤其猖獗<sup>③</sup>。

今日史學界一般的看法是：中國現代式民族主義首見於1890年代戊戌維新的一代。但我們在下面將指出：1890年代的所謂「民族主義」仍大半為「天下主義」陰影所籠罩。

### 一 天下主義自閉症之終結

無論如何，在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後，官方不得不承認「天下萬國」共存之局。清廷設立半現代式的外交部——總理衙門——就是承認這點。

相形之下，1890年代所謂改革「先鋒」的一代，在對世界知識方面，卻遠遠落後於官吏、通商口岸的記者和買辦。根據康有為自編年譜，他直到1874年才「始見《瀛環志略》、地球圖、知萬國之故，地球之理」<sup>④</sup>。梁啟超則於1890年從京師「下第歸，道上海，從坊間購得《瀛環志略》讀之，始知有五大洲各國」<sup>⑤</sup>。兩人該時都恰巧是17歲。至於都是讀了《瀛環志略》，或非巧合。當時中國有關世界知識的書，可能就只有有數的幾種，而且還可能是剛從「內部參考」開放為外售的。這裏暴露了當時教育制度之落伍，以及康梁諸人處於權力和資訊之邊緣地位。

然而，卻正是戊戌維新的一代推動了世界觀之革命，在符號學層次上了結天朝中心的自閉症。中國殘剩的自滿自得心理，在中日甲午戰爭(1894-1895)敗績後已蕩然無存。日本為西方炮艇政策逼迫而開國，晚於中國二十多年，但於

1870年代已向世界全面開放，不像中國只作有限的國防現代化。這兩個現代化計劃的長短，經甲午一戰即見分曉。敗於東方「倭國」，不比敗在西方列強手下，它產生的危機感，令中國中心的世界觀從根本上動搖。它促使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——亦即「公車上書」的一群——在一個擴大了的世界裏把中國重新放置。但是，他們仍然透過儒家的天下主義去理解現代國際局勢。他們設定的最高目標乃是「平天下」而不是建國。他們把儒教重新詮釋，以便包容達爾文主義，但前者仍佔主導地位。

十九世紀下半期流行的「達爾文主義」即社會進化論，這類單線進步圖式其實早於達爾文，其與後者結合出於偶然，乃維多利亞時代產品。單線進步觀大盛於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，其十九世紀之後繼者，以孔德(Auguste Comte)的智力進步三階段論為代表。單線進步圖式與達爾文進化論之間的橋梁是斯賓塞(Herbert Spencer)。和他同代的維多利亞思想家，還包括巴克爾(Henry T. Buckle)與緬因(Henry S. Maine)等人，但他們從來沒有和達爾文主義發生關係<sup>⑥</sup>。康梁是於1890年代下半葉從嚴復處得知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，但康在1885-1887年間已從公羊學說中衍生單線進步的「三世」說。他現在把斯賓塞的「進化論」接枝到他那個土產的圖式上頭，使公羊學說和維多利亞式社會進化論產生共鳴。

源於儒家今文學派的公羊學說，自漢末至十八世紀中葉皆處於睡眠狀態。康有為之偏向此旁門，說明他自身位於官方儒學的邊緣。他如今把生命重新灌注入此旁門，讓它具有現代的動力和進步感。在康未把它更動以前，公羊學說原是一個空想的「平天下」議程，經由三個階段展現：據亂世、升平世、太平世，每一階段有它相應的制度。太平或大同成分升級的時序，也表現為此成分在空間裏作同心圓漣漪式的擴散，直至取消「內外有別」為止。第一階段是「內其國而外諸夏」，第二階段是「內諸夏而外夷狄」。最高階段是連夷狄也能包含在儒家的世界秩序裏，達到「遠近大小若一，天下為一家，中國為一人」<sup>⑦</sup>。

說起「內外有別」，伊斯蘭教也把世界分成「伊斯蘭之居」(Dar-al-Islam)與「戰爭之居」(Dar-al-Harb)。公羊派的內外觀，遠不如伊斯蘭者好戰——它不是提倡對圈外發動「聖戰」，而是一個用和合方法一統天下的藍圖，而此天下則與「文明」同域。它亦不帶猶太基督教人類救贖史之目的論。在此中式「聖史」(sacred history)圖式裏，由亂致治之時序可逆轉，正如在空間上來說大一統帝國也會走向崩離析。公羊學家的意見並非一致，但總的來說以循環論為主。一治一亂不只反映乾坤之陰陽消長，也符合改朝換代的歷史規律。傳統公羊學家多視「太平世」為一個理想的更新，而不是實質上的復古，但他們總把該模範放在理想化的遠古「三代」，並非如康有為一般視其為展現於未來的一種潛能。

在重新發明的公羊學裏，太平或大同的理想是展望民治、平等、人類解放在全球範圍內實現——這些觀念都是現代的，也是西化的。展現這個理想世界的進程則是社會進化論式的，雖然它仍包裝在公羊三世說裏。公羊思考方式用「制度」來劃分時代，對政治程序和社會力不予分判，因此儒教聖王能用「改制」來創造新的社會形式。西方民主社會也被理解為如此一種「制度」。在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，康有為「幾乎着了迷，無時無處不談論它」的事項就是在宮中設立「制度局」。它先是一個體制改革研究所之構想，但康派亦想以它「略師泰西議院之制」<sup>⑧</sup>。在宮中設國會，固然不倫不類，但卻反映出中國一切改革必始自上的中央集權制度。

甲午一戰敗於東方「倭國」，令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在一個擴大了的世界裏把中國重新放置。但是，他們仍然透過儒家的天下主義去理解現代國際局勢。他們設定的最高目標乃是「平天下」而不是建國。他們把儒教重新詮釋，以便包容達爾文主義，但前者仍佔主導地位。

在新的公羊學裏，從前列於蠻夷的歐美等國，已被視為在「社會進化」的層階上超出中國：民主的美國在內政上已趨「太平世」，而君主專制的中國則仍處於「升平世」的初級階段。雖然，在全球範圍來說，人類仍處於戰國狀態的「據亂世」<sup>⑧</sup>。

這個儒學和社會進化論的混雜，今人看來或許是光怪陸離，但和該時代的西方社會思想頗為合拍。美國民族學局 (American Bureau of Ethnology) 的創始人鮑威爾 (John W. Powell)，於1899年在《美國人類學家》(American Anthropologist) 上發表的一篇論文，即把社會進化分作四階段：蒙昧、野蠻、君主、民主，而每一階段都有「各別的社會制度」<sup>⑨</sup>。康派的文明觀亦類似此，他們只不過把「白種人的負擔」轉移到孔子的肩上而已。地球既然仍處於「據亂世」，中國的使命就是與各國合作，共同致天下於太平。中國作為這個「大同」綱領的誕生地，仍不失其世界之「中」地位。梁啟超1897年的一段話，把此意圖表達得最清楚：「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治天下也，非治一國也，治萬世也，非治一時也，故首張三世之義。」<sup>⑩</sup>

去掉這類誇張的救世情懷，1890年代中國的「民族主義」不過乃一種新認識：世界是文明國家林立之局，大清必須卸掉大一統帝國的「制度」——蓋此「一統天下」已被區域化——並採取適用於現時的新制度。康在1895年甲午戰爭後的上清帝書，說的正是此意：當今之中國「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，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」<sup>⑪</sup>。康在1898百日維新期間的奏摺，就索性不談「治天下」，徑直地用達爾文式詞彙警告：「今為列國競長之時，則必以列國競長之法治之，而不參以分毫大一統之舊。」<sup>⑫</sup>但是，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，維新派又提出與建立民族國家背道而馳的「合邦」，亦即是「聯合中國、日本、美國及英國為合邦」<sup>⑬</sup>。此天真構想，仍不脫新公羊學「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」的餘味<sup>⑭</sup>。互不協調的新舊世界觀之間的緊張，最後終於把戊戌年代儒家和達爾文主義之綜合撕裂。

百日維新，終於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反撲下，趨於失敗。光緒帝被幽禁，康梁則亡命於海外。梁啟超抵日本後，與外界直接接觸的結果，連天下主義的餘燼也趨於熄滅。他在1899年寫道<sup>⑮</sup>：

我支那人，非無愛國之性質也。其不知愛國者，由不自知其為國也。中國自古一統，環列皆小蠻夷，無有文物，無有政體，不成其為國，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。故吾國數千年來，常處於獨立之勢，吾民之稱禹域也，謂之為天下，而不謂之為國。既無國矣，何愛之可云？

梁說其實並不新鮮。被今人定型為頑固派的張之洞，在1898年的《勸學篇》中已指出中國幾千年來無對手，因此趨於自閉<sup>⑯</sup>。

民族主義從天下主義分娩出來的陣痛，並非儒教文化獨有。歐洲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胚胎，亦先在基督教世界之腹內妊娠，後又寄於啟蒙運動世俗化的普遍主義理念中。後者最具代表性者莫如康德的「永恆和平」。如果康有為的「太平」是靠情感關切的普及於普天下來實現，康德的策略則在樹立一個超越的權利或法律理念<sup>⑰</sup>。在拿破崙入侵德國期間，德國的知識份子仍處於這種理性的普遍主義影響下，甚至連歌德與黑格爾也視拿破崙為「太平君主」(prince of peace)，乃「在一個新的理性基礎上重建西方文明的統一者」<sup>⑱</sup>。康德的徒弟費希特至1806年已開始反拿破崙，但他的「祖國並無自主的存在，它只是世界性理念的

在新的公羊學裏，中國作為這個「大同」綱領的誕生地，仍不失其世界之「中」地位。梁啟超1897年的一段話，把此意圖表達得最清楚：「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治天下也，非治一國也，治萬世也，非治一時也，故首張三世之義。」

一個實現場所而已」<sup>②</sup>。這句評語，也適用於戊戌年代公羊思想裏「中國」此符號所具之性質。

## 二 超民族主義之插曲：人種論

即使在公羊學盛行的時代，嚴復已經提出達爾文主義的「保種」主張。梁啟超於1897年——即戊戌前一年——已寫道<sup>③</sup>：

彼夫印度之不昌，限於種也。凡黑色、紅色、棕色之種人，其血管中之微生物，與其腦之角度，皆視白人相去懸絕。唯黃之與白，殆不甚遠。故白人所能為之事，黃人無不能者。日本之規肖西法，其明效也。日本之種，本出於我國。

當時西方和日本都盛行種族理論，戊戌維新派勢不免受其影響。因1900年「自立軍事件」殉難的唐才常，也認為「黃白智，紅黑愚；黃白主，紅黑奴；黃白萃，紅黑散」；並以「由賤種進良種之為順天，由頑種淪非種，由非種至亡種之為逆天」<sup>④</sup>。簡言之，一則為進化，一則為退化。

當天下主義退潮，而民族國家的符號系統還未確立之際，梁啟超等人唯有訴諸人種論。梁在1899年發表〈論中國人種之將來〉裏說：「他日於二十世紀，我中國人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。」他滿懷樂觀地列舉中國人種的優點：「一曰富於自治之力也」、「二曰有冒險獨立之性質也」、「三曰長於學問，思想易發達也」、「四曰民人眾多，物產沃衍，善經商而工價廉，將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權也」。中國人種潛力的釋放，只待「他日變更政體」、「合大群」和「開人智」<sup>⑤</sup>。這種極端樂觀的看法，和他在1900年以後把中國國民性罵個一文不值，簡直是天南地北。梁抽象地談人種，還可以主觀地列舉幾項積極因素。過了世紀之交，梁逐漸汲取「國民心理學」理論，用它的標準去衡量中國「國民」的心理凝聚程度，就顯出中國離「建國」還差一大截。尤其在1903年後，梁從期待「他日變更政體」轉為保皇，就更把中國「國民性」說得極不成熟，不配實行民主，自然更不該鬧革命。

梁1900年前的人種論，勢必有超國家超民族的衍義。他抵達日本後，即為「大亞洲主義」所眩。當時，這類超民族主義論風行於世界各地，如「大日耳曼主義」、「大斯拉夫主義」、「大美洲主義」、「大土然主義」(Pan-Turanism)<sup>⑥</sup>。但梁的超民族主義或許還有前一期思想的餘味。他認為<sup>⑦</sup>：

自此以往，百年之中，實黃種與白種人玄黃血戰之時也。然則吾之所願望者，又豈唯平滿漢之界而已，直當凡我黃種人之界而悉平之。……以與白色種人相馳驅於九萬裏周徑之戰場，是則二十世紀之所當有事也。雖然，黃種之人，支那居其七八焉。故言合種必自支那始。

這裏的合種、合邦思想仍有公羊學的遺留，雖然其範圍已從「一統地球」狹窄化為平黃色種界，為最後的黃白決戰作準備。人種大對決，可能是維新派的世紀末共識。唐才常也認為「今則駸駸有歐種與亞種爭之勢」<sup>⑧</sup>。

當天下主義退潮，而民族國家的符號系統還未確立之際，梁啟超等人唯有訴諸人種論。梁在1899年曾滿懷樂觀地撰文列舉中國人種的優點。這和他在1903年後從期待「他日變更政體」轉為保皇，把中國「國民性」罵個一文不值，並指斥其不配實行民主、不該鬧革命的言行相較，簡直是天南地北。

### 三 民族建國論與大同思想的分途

黃宗智認為：梁啟超的大亞洲主義，乃其儒家天下主義和後來「全面的民族主義」之間的「一個中途站」<sup>29</sup>。梁在1900年迎接新世紀，也宣布「中國」之誕生。他說：中國非但不是日本人譏笑的「老大帝國」，而是方今「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」的新生國家<sup>30</sup>。

梁亦從大亞洲主義的迷夢中清醒，看出它不過是日本大陸政策的煙幕。如今「中國」雖然從其他同文同種之間分化出來，但梁卻不免悲觀。他的「全面的民族主義」也受了加騰弘之修正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，這個修正就是對帝國主義現象的新認識。一直以來影響梁啟超的斯賓塞，是把部落性的「軍事社會」放在進化的低級階段，而視尊重個人權利和經濟自由放任的「工業社會」為高級階段。斯賓塞的進化論還帶有半宗教性質，認為進化的目的是使人類趨於完善。因此，它很對公羊學的胃口。加騰則是保守份子，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着眼現實政治、崇尚強權、軍國主義和集體性。1890年代日趨緊張的東亞局勢，已使日本自由主義鬥士德富蘇峰墮落為沙文主義者，去提倡他的「大日本膨脹論」，也導致高山樗牛的「日本主義」之抬頭<sup>31</sup>。加騰弘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，亦為同一背景之產物。

從1890年代波及東亞的國際緊張局勢，在世界其他地方亦點下火苗，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背景。在1901年，英國的優生學家皮耳遜 (Karl Pearson) 已在準備輿論，認為唯有在「種與種戰、國與國爭」之「戰場上毫不猶豫面對同儕」，國民精神才會「全盤健康」<sup>32</sup>。在1900至1902年間，美國的帝國主義者亞當斯 (Brooks Adams) 致力在精神上武裝國民，預備和舊大陸「決一死戰」<sup>33</sup>。1902年，霍普遜 (John A. Hobson) 發表分析現代帝國主義的經典著作，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之基礎。在同期間，梁啟超亦發展了他的帝國主義論。

在1899年，梁已經具有「資本日加，工業日盛，而歐洲全境，遂有生產過度之患，其所產物不能不覓銷售之地」的認識。面臨此世局，他悲歎中國人「不知有國民，於是誤認國民之競爭為國家之競爭，故不得所以待之之道，而終為其所制也。待之之道若何？曰，以國家來侵者，則可以國家之力抵之，以國民來侵者，則必以國民之力抵之」。惜乎中國的國家仍為「一家之私產也」，國民思想不發達<sup>34</sup>。在1900年，梁則把「國民競爭」的概念發展成「民族帝國主義」<sup>35</sup>。

至1901年，梁把「民族帝國主義」包含在他的新歷史圖式中，並且像列寧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」說一般，視其為「萬國大同主義時代」來臨之前夜。此新圖式仍有公羊學之蛛絲馬迹，公羊三世如今變為「過去」、「現在」、「未來」，其下又再分為六小階段。「過去」包含三小階段：家族主義時代、酋長主義時代、帝國主義時代。「現在」則分為民族主義時代、民族帝國主義時代。「未來」即為萬國大同主義時代。梁的診斷認為中國與西方皆處於過渡時代：「今日之歐美，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。今日之亞洲，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也。」如此一來，中國歷來的「天下主義」就被淪降為前現代的「帝國主義」，時代上屬於「過去」。而梁至為關切的是中國在「現在」的生存<sup>36</sup>。他對「未來」的關注反不如列寧，只把「未來」的大同世界當做一個遙遠的支慰而已。

梁把中國的「大一統」淪降為民族主義誕生以前的「帝國主義」，緊接下去的命題勢必為如何培養現代民族國家的國民品格，於是導致《新民說》之寫作。梁

至1901年，「民族帝國主義」在梁啟超的新歷史圖式中，就像列寧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」說一般，被視為「萬國大同主義時代」來臨之前夜。此新圖式仍有公羊學之蛛絲馬迹。如此一來，中國歷來的「天下主義」就被淪降為前現代的「帝國主義」，時代上屬於「過去」。

在1903以後，又採納新興的「國民心理學」理論，判定中國仍未達到現代國家的心理凝聚。「國民心理學」一詞，根據我的考據，可能源自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呂邦 (Gustav Le Bon) 的psychologie des peuples，但有一部分內容來自並沒有掛心理學招牌的伯倫知理 (Johann C. Bluntschli)。後者為梁氏的偶像，但其說亦為孫中山革命派所引用，因此已超出戊戌時代的範圍，而且另有專著，此處不再贅述<sup>⑤</sup>。在這裏只需簡單地指出：國民心理學比人種說更能解釋民族國家的性質。英與德都是條頓民族，英與美同為英語國家，中與日誇稱同文同種，但卻各自建立不同的國家。因此，人種本身並不足以界定民族國家。國民心理學的看法是：民族國家必具共同的歷史背景和集體心理，它的組成分子是呂邦所謂的「心理的品種」而不是生物的品種。

當梁啟超緊跟時代，針對當前局勢尋找出路，康有為卻固置在戊戌年代大同主義和維新派世紀之交的人種說上頭。他的《大同書》正是該兩者之混合。此書據說成於1902年，因此責它沒有趕上後繼的時代，或許是過苛。但全書的發表，是在康去世以後的1935年，有充分時間讓他修改，如果仍與時代脫節的話，只能用康的思想已經定型去解釋。

《大同書》顯然是儒家「天下主義」之現代版，並摻以傳統的佛道與仙道。在當日民族危機日深之際，康卻大談去九界，並且還從「去國界」開始做起，一步步地「去級界」、「去種界」、「去形界」、「去家界」、「去產界」、「去亂界」、「去類界」、「去苦界」。作為一種追求人類平等和解放的烏托邦思想，《大同書》有其積極意義——某美國學者甚至把它和馬克思的《共產黨宣言》作比較<sup>⑥</sup>。

但《大同書》亦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思想。康理所當然地認為「種有黃、白、棕、黑貴賤之殊」<sup>⑦</sup>，唯黃白兩者可分庭抗禮：「白種之強固居優勝，而黃種之多而且智。」但在外形上，黃種人務必與白種趨同，其法先採用西式飲食，「加以二三代合種之傳，稍移南人於北地，更易山人於江濱，不過百年，黃種之人，皆漸為白色，加以通種，自能合化，故不待大同之成，黃人已盡為白人矣。是二種者已合為一色，無自辨別，唯棕黑二種與白人遠絕，真難為合者也」<sup>⑧</sup>。康的論據，與今日東亞地區膚淺地用外形「難看」去歧視黑人的心理，全盤一樣：「其黑人之形狀也，鐵面銀牙，斜頷若豬，直視若牛，滿胸長毛，手足深黑，蠢若羊豕，望之生畏。此而欲窈窕白女與之相親，同食，蓋亦難矣。」但為了世界大同的來臨亦得勉強行之，蓋「變形無由，淘汰不盡，則世界終無由至於大同也」<sup>⑨</sup>。他樂觀地預測：「故知他日黃、白人之與棕、黑人雜婚而化其種者，不可勝數也。故欲致諸種人於大同，首在遷地而居之，次在雜婚而化之，末在飲食運動以養之，三者行而種人不化，種界不除，大同不致者，未之有也。當千數百年，黃人既與白人為一矣，棕黑人之淘汰變化，餘亦無多。」康的思想仍是儒家和達爾文主義的雜燴，既提倡大同，又訴諸淘汰一途：「其棕、黑人有性情太惡、狀貌太惡或有疾者，醫者飲以斷嗣之藥以絕其傳種。當千數百年後，大地患在人滿，區區黑人之惡種者，誠不必使亂我美種而致退化。」<sup>⑩</sup>

當時種族思想盛行，但康受其影響者卻是白人至上主義。雅利安種族神話之支柱正是「北溫帶論」，因此康才有「移南人於北地」之構想。認為外界環境可塑造遺傳質料者，是拉馬克學說，在當時已過時。康訴諸優生學，但卻昧於優生學重遺傳而輕環境的前提，而且還認為良種多為「北溫帶」產品。

康有為的《大同書》顯然是儒家「天下主義」之現代版，並參以傳統的佛道與仙道。作為一種追求人類平等和解放的烏托邦思想，某美國學者甚至把它和馬克思的《共產黨宣言》作比較。但《大同書》亦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思想。康理所當然地認為「種有黃、白、棕、黑貴賤之殊」，唯黃白兩者可分庭抗禮。

如把康的說法和同代的種族主義者張伯倫 (Houston S. Chamberlain) 作一比較，頗有趣味。張伯倫敵視的是猶太人，並非黑人，但其認為北歐種最優秀則與康同。但當某良種——例如，條頓民族——一旦成形後，張伯倫的主張是必須盡量保持其純粹性，反對任何的雜種化。這與康的「去種界」剛好相反。兩者之別，或許正是猶太基督教「選民」觀念和儒家「大同」思想之差異。張伯倫對「天下主義」的評語如下：「羅馬帝國晚期的無人種、無民族的渾沌乃是一個有害的、致命的狀態，乃違反自然之罪惡。只有一線光明照耀在此墮落的世界之上——它來自北方。」<sup>④</sup>

康的思想底子既然是天下主義式的，因此他始終沒有走上民族主義道路，到了晚年更演變為「天遊之學」，要把「平天下」觀念擴展至全銀河系，其想像已近乎科幻小說。該傾向在其《大同書》中已見端倪<sup>⑤</sup>：

諸星既通之後，……國土之大小無盡，則合併國土亦無盡，窮極合並至於星團、星雲、星氣，更無盡也。合併國土無盡，則國土戰爭，生靈塗炭亦無盡也。今火星人類國土之相爭，其流血數千萬里，死人數千百萬而吾不知也。即吾大地大同，吾之仁能及大地矣，其能救諸星乎？

康有為的思想底子是天下主義式的，因此他始終沒有走上民族主義道路，到了晚年更演變為「天遊之學」，要把「平天下」觀念擴展至全銀河系，其想像已近乎科幻小說。

換而言之，即使地球已臻太平之世，整個銀河系仍將處於據亂之世，儒家的大同學說還有其用武之地。

### 註釋

- ① 范文瀾：〈自秦漢起中國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〉，《歷史研究》編輯部：《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57）。
- ② Hao Chang, "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, 1890-8", in *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*, vol. 11, pt. 2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0), 296.
- ③ Frank Dikötter, *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2), chaps. 1 & 2.
- ④⑤ 康有為：《康南海自訂年譜》（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5），頁7；14。
- ⑥ 梁啟超：〈三十自述〉，《飲冰室合集》第2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11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36），頁16。
- ⑦ George W. Stocking, Jr., *Victorian Anthropology* (New York: The Free Press, 1987), 128-29.
- ⑧ 孫春在：《清末的公羊思想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5），頁13、163。
- ⑨⑩⑪ 孔祥吉：《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》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309、311；364；414-15。
- ⑫ 梁啟超：〈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〉（1897），《飲冰室合集》第1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2，頁7-11。
- ⑬ Marvin Harris, *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* (New York: Thomas Y. Crowell Company, 1968), 255.
- ⑭ 梁啟超：〈《春秋中國夷狄辨》序〉，《飲冰室合集》第1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2，頁48。
- ⑮ 康有為：〈上清帝第二書〉，湯志鈞編：《康有為政論集》，上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），頁122。
- ⑯ 梁啟超：〈愛國論〉，《飲冰室合集》第1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3，頁66。

- ⑰ William Ayers, *Chang Chih-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1), 154.
- ⑱ Robert Caponigri, introduction to *Perpetual Peace: A Philosophical Essay*, by Immanuel Kant (New York: The Liberal Arts Press, 1948), xi. 康德的 *Zum ewigen Frieden* 發表於1795。
- ⑲ Hans Kohn, *Prelude to Nation-States: The French and German Experience, 1789-1815* (Princeton, N.J.: D. Van Nostrand Company, Inc., 1967), 149. 參閱同作者 *The Mind of Germany: The Education of a Nation* (New York: Harper and Row, 1960), 36, 58, 72-73.
- ⑳ Kohn, *Prelude to Nation-States*, 233.
- ㉑ 梁啟超：〈論中國之將強〉，《飲冰室合集》第1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2，頁13。
- ㉒⑳ 唐才常：〈各國種類考自敘〉，《覺顛冥齋內言》(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8)，頁466-67；468。
- ㉓ 梁啟超：〈論中國人種之將來〉，《飲冰室合集》第1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3，頁48-54。
- ㉔ 即大土耳其主義，或泛突厥聯盟。
- ㉕ 梁啟超：〈變法通義〉，《飲冰室合集》第1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1，頁83。〈變法通義〉這一節寫於1898年12月，但整篇是從1896至1899年系列地發表。黃宗智的梁啟超研究不暨及此，認為梁的大亞洲主義可上溯至1896年。
- ㉖ Philip Huang, *Liang Ch'i-ch'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* (Seattle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72), 49.
- ㉗ 梁啟超：〈少年中國說〉，《飲冰室合集》第1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5，頁7、9。
- ㉘ 湯重南等編：《日本帝國的興亡》(北京：世界知識出版社，1996)，頁368-75。
- ㉙ Karl Pearson, *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ce* (London: Adam and Charles Black, 1901), 34, 50-51.
- ㉚ Richard Hofstadter, *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, 1860-1915* (Philadelphia: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, 1945), 161-62.
- ㉛ 梁啟超：〈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〉，《飲冰室合集》第1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4，頁58-60。
- ㉜ 「民族帝國主義」一詞初見於〈二十世紀太平洋歌〉，《飲冰室合集》第5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45(下)，頁19。此文作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天和二十世紀頭一天交接的午夜，而梁正前往夏威夷，其坐船正於此刻渡過國際子午線。但此歌發表於1902年。
- ㉝ 梁啟超：〈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〉，《飲冰室合集》第1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6，頁12-22。
- ㉞ Lung-kee Sun, "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Late Qing Period", *Modern China* 18, no. 3 (July 1992): 235-62.
- ㉟ Laurence Thompson, "Ta-t'ung Shu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", in *K'ang Yu-wei: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*, ed. Lo Jung-pang (Tucson, Ariz.: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, 1967).
- ㊱⑳㉒⑳㉔ 康有為：《大同書》(北京：古籍出版社，1956)，頁124；114-15；118-19；121-22；54。
- ㊲ Houston S. Chamberlain, *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*, vol. 1, trans. John Lees (London & New York: J. Lane Company, 1911), 320.

**孫隆基**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，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及史丹福大學之碩士及博士學位；曾任教於坎薩斯大學、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和加拿大阿爾拔塔大學，現任教於田納西州孟菲斯大學。著有《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》、《未斷奶的民族》，備受學術界及社會注意。